

历时138天,穿越近7000公里,两位德国作家骑行重走长征路——

不理解长征精神,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

本报记者 刘赫

我和中国的故事

看点

穿雪山、过草地、越黄土高坡、看城镇建设。德国作家福尔克·黑林和克里斯蒂安·施密特骑行重走长征路的旅程,不仅是一次对体力与意志的极限挑战,更是一次感悟中国红色历史、深入当代中国社会的实地考察。在他们看来,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更是矢志不渝的执着坚守,也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最真实的行走体验,推动他们不断向德国民众讲述跨越90年的长征精神与鲜活生动的当代中国。



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

“让西方民众真正了解中国,仅靠书籍和文章远远不够,亲身体验尤为重要。”黑林说,随着中国入境免签政策的全面实施,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和博主前往中国,通过图片和视频记录所见所闻,这种方式具有积极意义,“只要亲自去看一看,人们自然会形成更客观的判断”。



今昔交汇,脉动同频——

“在行走中真正触摸当代中国的发展脉搏”

车轮再次转动,路面已变得宽阔平整。这是一段新修的公路,沥青在阳光下泛着微光。远处的山体被隧道贯穿,一列高铁列车呼啸而出,几秒钟后消失在另一侧。

事实上,这不是黑林第一次向西方公众普及关于中国的知识了。上世纪90年代,年轻的他初次踏上中国土地,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几乎一无所知。30多年过去,他已经在中国骑行超过6万公里,带过一支又一支骑行团穿行于中国的城镇与乡野,也成了朋友圈里公认的“中国通”。

“90年代我去中国学习中文时,还没有胆量骑行中国。我记得那时火车票还很难买,我只能坐长途汽车,从新疆知名旅游城市吐鲁番一路坐到中部地区一个城市,辗转3500公里,仅最后一段车程就坐了24个小时。”黑林说,“现在完全不同了,我亲身体会到许多变化。”黑林笑言,在二人途经大渡河时,发现那里新建了许多水坝,一路上也看到大量高架桥与高铁线路建设如火如荼。在他看来,中国的基础设施有了极大改善,“如今在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可以长时间在低车流环境中骑行了。移动支付、电子地图等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出行各个环节,让旅行变得更加便捷。”

施密特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说,过去前往偏远地区,尤其是高原地区,往往受困于路途遥远、颠簸之苦;如今,高铁网络不断延伸,旅行便利性大幅提升。

出发之前,黑林和施密特曾有个共同的疑问:一路上还能见到多少与长征有关的痕迹?出发之后,他们很快发现,沿途各地对长征历史的保存与呈现,远远超过预期。步道、墙绘、群雕、红色标识,连同博物馆与纪念馆,几乎每隔一段路就会出现。在瑞金、遵义、泸定桥这些关键事件地点如此,在很多县乡、山口和渡口也同样如此。“长征并未因年代久远而退出中国人民的生活。”黑林说,“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

如何理解长征精神?在黑林眼中,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更是矢志不渝的执着坚守,“这是一种团结的精神,当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起努力去做同一件事,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艰难险阻。”长征精神跨越岁月、超越时空,从中国走向世界,至今仍为各国人民赞颂与钦佩。

“骑行途中,我们常听当地人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断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过难关、出实绩、谋长远,我想,这应该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黑林说。

骑行中国的经历精彩且令人着迷,黑林和施密特希望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去中国看看。”黑林认真地说,“近距离感受中国,在行走中真正触摸当代中国的发展脉搏。”

我眼中的中国

2002年冬天,我在中央电视台主持意大利语节目,名字就叫《我眼中的中国》。那年的春节假期,我独自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浙江温州,坐船北渡瓯江,又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来到永嘉县岩头镇,探寻楠溪江流域的文化。

带着一台录音机,我一路感受、一路采访。回北京后,我利用这些素材制作了6集广播节目,介绍了楠溪江流域的文化、“七星八斗”的村庄布局、当地春节习俗等等,收获了不少好评,还有听众通过电子邮件表达对节目的喜爱,说自己也想去看看。那一刻我意识到,非遗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拉近民众友谊的切口。

在中国工作、生活的这些年,我利用业余时间到各地采访了不少民间艺人。尤其是在有着“百工之乡”美誉的温州定居后,我先后拜访了几十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聆听他们的故事后,深深地被他们的匠心与执着感动。我曾经疑惑,中国非遗为什么能够代代传承,历经时代变迁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几十年的走访观察与思考后,我有了自己的答案。

中国非遗是深受重视的。在中国,非遗从不是被束之高阁的陈列品,而是备受珍视的文化瑰宝。在撰写《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时,为了能彻底了解这些散落在城市和乡村的非遗项目,我几乎走遍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随着采访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并非某个单独个体即可完成的,这是一项多方协作的系统性工程。既有地方政府的全局谋划、有关机构的尽心协助,也有每一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非遗爱好者的矢志不渝。以瑞安为缩影,中国对非遗的重视是有目共睹、落在实处的。

中国非遗是历久弥新的。不久前,我有幸前往福建拜访了几位福船师傅。泉州、漳州……行走在福建的沿海城市,我欣喜地看到,有关福船的研究中心与文博机构遍地开花,不仅是学生研学的好去处,也成为中外游客了解福建海洋文化的重要场所。冰霜贴、毛绒挂件、积木模型,各类以福船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广受欢迎,成为伴手礼首选。福船的时代早已结束,但“福船热”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从福建人的生活中消失,它早已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另一种形式传承至今。

中国非遗是融入生活的。非遗与日常生活的距离非常接近,保存着一个地方的生活记忆,也承载着民众对一个地方的感情,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增进了解和尊重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创新智慧融入古老非遗,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传播,中国非遗正从历史深处走向世界舞台。从全球赛龙舟到首个“非遗版”春节,从融合苗绣、银饰等非遗元素的贵州“村T”成功破圈,到《黑神话:悟空》游戏场景中的木构建筑带火山西文旅……中国非遗正悄然跨越语言与地理的鸿沟,在世界舞台上,以新的方式被看见、被理解、被记住。

我的手机里始终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一封从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秘书处寄出的信件,信中表达了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的感谢和问候——“唐老师这本书写得很好,有利于意中文化交流,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这是2022年《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出版后,我收到的一份难忘的礼物。几十年来,我一直奔走在意中文化交流一线,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想要继续做的,还有很多。未来我期待以非遗为媒介,让更多没有到过中国的意大利人,能对中国有更全面、更客观的了解,为意中人文交流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作者为意大利汉学家、温州市荣誉市民,本报记者刘军国采访整理)

图①:在贵州兴义市一家餐馆内,当地小朋友拿出语文课本教施密特学习中文。

图②:骑行4个多月后,黑林(左)和施密特到达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点陕西延安吴起县。因为二人在“胜利的号角”雕塑前合影留念。

图③:黑林(左)和施密特抵达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以上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本版责编:白阳 李安琪
版式设计:蔡华伟

中国非遗为何具有鲜活生命力

唐云

德国柏林,晚风带着些许凉意,中国文化中心大厅却热闹非凡,暖意洋洋。

很多德国民众早早聚集在这里,等待福尔克·黑林和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讲述他们在中国骑行重走长征路的故事。

2023年至2024年间,黑林与施密特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西进北上,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骑行4个多月,到达陕西延安吴起县。

“如果你不理解长征精神,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20多年前,一位红军老战士告诉黑林。

黑林登上讲台,穿着一件自己设计的黑色T恤,胸前印有醒目的“长征”二字。“从那天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做这件事。”黑林的目光透着坚定。



踏雪寻踪,叩问历史——

“亲身体验过才真正明白雪山究竟有多惊险”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

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夹金山脚下,向着这座当地人口中的“死亡之山”进军,这是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以夹金山为起点,黑林和施密特向记者讲起了自己的“骑行长征路”。

“当时,风不断从侧面刮来,裹挟着雪粒与寒气。”骑过1.7公里的崎岖山路,接近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时,黑林已无法骑行,只能推车在雪地里艰难爬升。不远处,施密特步履沉重,耳朵发出阵阵鸣响——“再往上,空气更稀薄了。”

雪线之上,气温骤降。黑林回忆起那天情形:“山上植被越来越少,远处的悬崖峭壁令人心惊,迎面而来的寒风夹杂着雨雪,格外刺骨。”当时已经67岁的施密特忧心忡忡:“我想我一定是疯了才会出现在这里,不知道身体还能不能撑住。”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依靠药物才勉强撑了下来。当他们终于登上垭口,已是筋疲力尽。

“91年前,面对围追堵截,身穿单衣、脚穿草鞋的红军战士毅然踏上了征服雪山的道路,历时七天七夜。而我们骑着电动自行车,身穿冲锋衣,却已经感到身体在接近极限。”黑林不禁感慨。施密特也坦言,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翻越雪山”,总觉得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只有当风声盖过一切声响,感到脚下每迈一步都极为艰难——亲身体验过才真正明白雪山究竟有多惊险,也才更真切感受到红军的坚韧与勇气。”

黑林15岁时,第一次接触到长征,深感震撼的他此后陆续阅读了大量史料。伟大长征精神何以跨越时空,影响几代中国人?带着好奇与疑问,54岁那年,黑林与志同道合的施密特一拍即合,共同踏上了“骑行长征路”。

近7000公里的路途,对两人而言是一次冒险之旅,更是对体力与意志的巨大考验。寒夜如冰,他们常常整宿无法入睡;行至川西地区,严寒、逆风、高海拔与连绵起伏的地势,让下坡也寸步难行。骑行后半程,机械故障接踵而至:变速器失灵,车轮辐条折断,甚至在距离终点约450公里处,黑林的电动自行车电机彻底报废,他们不得不临时改线,绕行那些失去

电助力几乎无法征服的陡爬升路段……

黑林说,骑行长征路的过程中,他们深刻感受到了当年红军一路的艰辛。看到今天中国的发展变化,更让他感受到中国这一段历程的不易。

亲身见证,打破偏见——

“只要亲自去看一看,人们自然会形成更客观的判断”

如果说雪山、草地、峡谷让他们触摸到长征的“冰冷”,那么人与人的相遇,则让他们感受到中国人的“温暖”。

“我们两个经常被请吃饭。”黑林调侃道,在中国骑行时,一旦人们知道他们在重走长征路,原本的拘谨和迟疑就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与尊敬。

关于“吃饭”的故事,有着很温暖的回忆。那是一座小城的餐馆里,黑林和施密特正在用餐。也许是不常见外国人,一群好奇的孩子围到餐桌旁,聊着聊着,竟主动当起中文“小老师”,耐心教他们练习发音。“那真是轻松而真诚的交流,孩子们的笑脸是整个行程中最令人动容的美好瞬间。”黑林微笑着回忆。

在困难与挑战面前,一路遇到的真挚善意更加令人难忘。骑行途中,黑林和施密特曾休整了3个月重回贵州遵义。此前,他们把自行车停放在酒店的地下室,与一堆旧家具、工具和零配件做伴。要是工作人员换了,没人记得我们怎么办?这些自行车会不会被当成无主之物?电池的情况怎么样?3个月没有充电,它们还能用吗?一连串的担忧,在抵达酒店门口时烟消云散。“你们的车都好着呢!”门卫赵大爷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

四川西昌的自行车店店主老戴,经营店面30多年,为黑林和施密特更换了新链条和轮胎,还贴心提供了许多实用的骑行建议;延安的当地导游小李英语流利,带着他们参观了许多红色景点;迷路时,有人帮忙打听,也有人告诉他们下一班火车何时来、哪条小路还能走……黑林回忆着,眼中闪烁着温情的光芒:“遇到了那么多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是这一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2025年10月,两人记录此次骑行的著作《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在德国出版。他们在汉堡、莱比锡、柏林等德国多地举办分享会,许多当地民众手捧书籍,排着长队等候两位作者签名。

德国驻上海原总领事芮悟峰是读者之一,他深为触动地说,骑行是深入了解中国的一种理想方式,能够让人更好地融入环境,更深入感受风景与人文,获得直接而真实的体验。德国读者凯思琳·克鲁特曾在中国生活12年,走访过苏州、杭州、青岛等地,但尚未去过长征沿线。她告诉记者,此次专程前来聆听黑林的分享,让她重温在华岁月的同时,仿佛也置身

在“眼儿都”用西语说相声

雷迪斯·弗兰科

在我看来,翻译相声的难度不亚于诗歌,既要把文本的意思表达清楚,还要精准传递出“笑点”,这其中有着相声,有典故,还有生活经验。比翻译相声更难的则是说相声,怎样抖响包袱,如何接住观众的话茬儿,都需要地道的功夫。

为了说好相声,我成了相声茶馆里的常客。说实话,一开始坐在茶馆里我只能听懂演员们说什么,但确实没领会到笑点,只能在大家的笑声里尴尬地跟着咧咧嘴。后来,我从网上搜索经典相声的音视频和文本,一点一点地拆解,了解每段相声的特点。机缘之下,我还向相声泰斗马三立之孙马小川先生请教,进一步了解天津相声文化。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喜爱相声这种传统曲艺形式。更重要的是,相声在宽松闲适的环境里,通过幽默来开解人们的心情,提醒大家生活中需要注意的细节,这一点和拉美人的乐天幽默很契合,这让我们对西语相声越来越有信心。在我们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着急》《旅行家》《友谊颂》等中国经

典相声作品被改编成西语版本,由师生们共同演绎,并通过网络传播给世界各地的观众。

西语相声的改编、排练和表演过程中,我和搭档穿大褂,挥折扇,在保留相声传统形式以及技法的同时,更注重幽默感的挖掘转化,将中式的“包袱”转化成西式的幽默,还借脱口秀加入一些即兴创作,就像传统相声中的“现挂”,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在我看来,天津就是我的“第二故乡”。用西语说相声就像是推开一扇窗,为我观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座宝库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也提供了跨文化交流的新思路。现在,我还有了新的“客串”职业——天津博物馆的首个外籍讲解志愿者。我期待为更多来自西语国家的游客讲述每件展品背后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添砖加瓦。

(作者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外籍教师,本报记者新博采访整理)

老外不见外

我的中文名字叫吴瑞龙,来自委内瑞拉,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1年。2015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先后获得汉语言文学和跨文化教育的学位后,我成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的一名外籍教师。

生活在“眼儿都”天津,你很难不被相声吸引。作为相声的发源地之一,相声艺术在天津有很深的群众基础。相声茶馆、小剧场里,精彩演出轮番上演;博物馆、档案馆中,相声历史源远流长;天津市民也自带“喜感”,谈笑间都像在展示“说学逗唱”。渐渐地,我也爱上了这一中国传统曲艺形式。

真正让我和相声结缘的,还是西语系发起的“面向西班牙语世界的天津相声文化推广项目”。学生们负责台本写作、视频传播等幕后工作,希望我们这些外籍教师能够进行翻译指导并参与表演。既能客串一把相声逗乐,又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语言,何乐不为呢?我欣然接受了学生们的提议,穿起大褂,挥起折扇,开启了我的“相声演员”生涯。



弗兰科(左)向相声演员请教快板表演技巧。受访者供图